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文学 50 年/杨匡汉, 孟繁华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8

ISBN 7-5004-2595-3

I. 共… II. ①杨… ②孟…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1949~1999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130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1201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5 插页: 6

目 录

绪 论	关于共和国文学	(1)
	一、“共和国文学”概念的提出	(2)
	二、文学演变与历史关联.....	(7)
	三、文学实绩和当代性特征	(14)
第一章	毛泽东文艺思想阐释	(22)
	一、新文化猜想与战时文艺主张	(26)
	二、亲和民众的思想倾向	(38)
	三、文艺功能观的内在矛盾	(50)
	四、“中国化”的现代性经验.....	(63)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	(74)
	一、“一为”与“二为”	(75)
	二、由“改造”到“引导”	(84)
	三、文学组织与作家的体制化	(93)
	四、文学创作的运作与管理.....	(101)
第三章	创作主体的姿态与心态	(110)
	一、跨时代作家的转变与调适.....	(111)
	二、歌哭与共：和共和国一起成长.....	(120)
	三、蹉跎岁月：苦难中的想象.....	(130)
	四、文学新人的形式求索.....	(142)

第四章	新人物形象的形成与调整	(150)
	一、工农兵形象的确立与净化.....	(155)
	二、知识分子形象的“成长”特质.....	(166)
	三、“英雄典型”的身份与类型化	(177)
	四、“中间人物”的策略性命名	(186)
第五章	农民文化与乡土之恋	(196)
	一、与黄土地亲近的文化血缘.....	(198)
	二、乡村记忆和乡土文本.....	(203)
	三、家族故事与土地神话.....	(224)
	四、田园诗情与信仰之地.....	(231)
第六章	城市时代和城市文学	(246)
	一、城市化进程与文学的转折.....	(251)
	二、物化主题及其现实表现.....	(271)
	三、迷濛中的生长	(281)
	四、艺术感觉与城市情绪.....	(293)
第七章	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	(310)
	一、女英雄模式与性别泯灭.....	(313)
	二、文化寻父与颠覆男权.....	(321)
	三、家园回望与重写母系.....	(338)
	四、女性写作的期待与限度.....	(345)
第八章	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文学的多元化	(357)
	一、现代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359)
	二、意识萌动与叙事实验.....	(369)
	三、朦胧诗与新生代.....	(378)
	四、先锋派文学及其评说.....	(389)

第九章	一体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学	(417)
	一、文化融合的新阶段.....	(417)
	二、民族性追求的焦虑.....	(431)
	三、“异族情调”与回抱传统	(442)
	四、开掘民族文学的诗性智慧.....	(456)
第十章	文学批评与批评家的选择	(468)
	一、“双百”方针的坎坷历程	(469)
	二、批评家的双重使命与两难处境.....	(479)
	三、批评观念与批评方法的更变.....	(489)
	四、新的批评倾向与批评格局.....	(498)
结 语	终结与开始	(512)
后 记		(520)

绪 论

关于共和国文学

“1949—1999”将长存于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历史不是由个人发动，而是顺潮流而来的。机遇永远钟情于有特殊准备的民族。五十年前，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暴风骤雨中诞生，从此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屈辱历史。站起来的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变革，为建设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一切的宝贵来自伤痕和代价。经历“文革”浩劫后的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和九十年代的理性探求，人民共和国更加风鹏远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历史的丰碑上赫然镌刻着四个大字：中国，进步！仅仅五十个春秋，共和国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她的儿女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其名列当今全球前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世界一道维护和平、捍卫正义、开发合作。在共和国摇篮里共同成长的人们，把光荣和梦想写进彩虹，自然，也会把对祖国的承诺带给每一个早晨。

半世纪沧桑演进了历史巨变，五十度风雨创造了文学中国。作为时代琴弦上的搏动与变奏，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以其宏伟叙事，也以其划时代的进步性和不可逆性，在苦难与奋取中拥有了自身持续发展的潜质与内力。它象征着一种信念，塑造着一种形象，论

释着一种启迪。也因此，从学理层面上总结其经验教训，探讨其荣辱得失，便成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一、“共和国文学”概念的提出

当我们回眸与论及中国文学时，首先会遇到诸如“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近期多有沿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文学”等等概念。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世界与自身的过程中，大凡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取出来，加以归纳，就形成了概念。上述的文学概念，体现了文学史家对历史地存在过并正在发展中的“文学事实”的归纳，表明了史家与论者对“文学运动”的把握、描述乃至某种“构造”，自然，还揭示了蕴含于文本、文体、文学现象及文学理念的意识形态因素和人文背景。

如此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文学”的概念，显然是出于“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①的理念，以晚清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世纪的文学进程为对象，展开更大时段的文学史考察、研究、总结与概括，其方法论特征是强烈的“整体意识”，且意味着把目前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相割裂的研究格局予以打通；“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概念，一般是指为“救亡、启蒙、民主、科学”的主题词所孕育，以“五四”（1919年5月）新文学运动为发端延伸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1949年10月）此一历史时段的文学，按照权威的解释，“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被界定为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即包含着多种阶级成分及流派主张——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残余的封建文学”和“法西斯文学”，并在分类分派的基础上确定主流与主导；^①至于“当代文学”的概念，通常是指自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降并至今尚在延续的文学，在一批由研究机构和大学撰写的“当代文学”的教材和论著中，“当代文学”被视为独立的文学时期，且确认其“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

我们不妨看一下一些论者关于“当代文学”概念的阐述。

如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述：

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②

又如《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界说：

①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第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我国版图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优秀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人民文艺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都产生历史性深刻变化的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①

此外，还有从文学自身出发的表述，如：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它受到始于 1919 年的新文学革命确立的目标的规约。它使新文学的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展和扩大。中国当代文学持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即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当代文学继续扩大白话对文言的战胜，它使中国文学在语言运载上更为接近中国当代人的习惯。^②

上列“中国当代文学”的诸种概念，都可以聊备一说。不过，当我们翻阅近四十种“当代文学史”一类的教材和大量“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时，不难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指的是大陆五十年代以来的汉族文学，而把港澳台地区的当代文学和国内

① 《中华文学通史》第 8 卷“当代文学编”绪论，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谢冕：《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评论》1996 年第 2 期。

除汉族外 55 个兄弟民族的当代文学编入另册。人们都在说中国是完整的，但当代文学门类的研究却是破碎和割裂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许只能称为“半部”、“多半部”而不是“全部”。究其原因，是我们的研究往往受到泛意识形态、经验美学和自身视野狭小三种局限，从而难能展现全景，并在一个整体格局的背景下进行更深入的学理性阐发。

文学自然不能脱离意识形态。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无疑要折射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要映现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风云，要表达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或各种理念，各民族各地区的当代文学概莫能外。文学也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人文环境。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源于同一文化母体的统一的中国文学，自五十年代始以台湾海峡为地域的划分，在大陆和台湾（还有香港和澳门）两个迥异的社会环境中各自独立发展。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据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的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体制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深深制约和影响文学的发展，从总体上塑造着多元的文学形象，表现出盛衰进退的不平衡状态。我们坚持一个文学中国的立场。从分离的角度去看，是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和文学的悲剧；但在综合的效果上看，则可以获致文学互补性的充实与赅备。这样，当我们谈到“中国当代文学”，自然必须面对“两岸三地”（海峡两岸，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的文学事实，也必须面对众多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风貌，而不宜以大陆的、汉族的当代文学等同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完整概念。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近半个世纪，鉴于港澳台地区长久以来没有回归和统一，没有改变生养于祖国、受制于异族的局面，其文学自行其道，事实上并没有纳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命运。这样，

我们提出以五十年为相对独立时段的“共和国文学”的文学概念，着重考察的是新中国大陆文学在选择并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如何经历种种探索和经受重重磨难所获得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如何以时代的晴雨表与现实的多棱镜的身分感应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脉搏而留下曲折中前进的印证，如何在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传达着民族的颂歌和悲歌，如何从对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主张的鉴别中经过反思而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如何从一种绝对支配地位的文学形态发展到既肯定主流又承认多样的足可共享的文学时空，又如何有大批立志于年轻之时、追求于毕生之途的文学工作者在不无彷徨和困扰的奋斗中为共和国文学的成长贡献了宝贵的血泪、智慧和才情。从共和国文学的运动过程、展开方式、路线实施以及对所要争取的文学前景的“预设”来看，五十年来我们无疑希望将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希望它以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这种“人为”的努力受到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教育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与制约，在行进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共和国文学在风风雨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实践中，实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又一次重要的文学变革，并取得了新的成果和经验。可以告慰新文学先驱们的是，他们当年所追求的文学理想和美学目标，许多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被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作家和批评家向前推进了。

把几代作家的艰难奋取及其内心经验集合起来，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堪称一座雄伟而悲壮的精神博物馆。从五十年前仅有 400 多名作家到今天拥有 6000 多名的中国作家队伍，从当初一年只出 100 多部作品到今天作家每年向社会贡献上万种图书，年轻的共和国文学已从稚嫩的小叶成长为高高的大树。这是为振兴中国文

学而历尽沧桑不懈奋取的五十年，是印有冬天的刻痕和留下春天的记忆的五十年，是为迎向新世纪的太阳奠定深刻与沉重的文学基础的五十年。

二、文学演变与历史关联

共和国文学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内地生成，在特定时间和地域演变与推进。其生成与演进，都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相关，也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从而反映了文学如何被规范和赋予何种意义的特点。五十年来，中国大陆顺乎历史潮流地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继而选择并有效地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与之共脉搏的共和国文学，也就有了涵义上的呼应和阶段上的划分。这一点，我们从文学界的领导者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最初在1949年7月5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根据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提出了迈入新时代必须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要求。他特别就新中国文艺提高思想性问题作了阐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的行动不再是自发的、散漫的、盲目的，而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按照一定目标进行的；这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是被政策所指导的，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利益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新的人民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根本规律。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映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作品的高度思想性主要就表现在对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的深刻的揭

露。”^①他宣称当时已出现了具有“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的新的文学形态，但在文学性质是否已转型至新的阶段上，仍持慎重的态度。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处于一个过渡时期，1952年周扬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但“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②

对于这种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是“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手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文学，茅盾从塑造人物形象角度的描述是充满激情与想象的。他写道：

工农兵是我们新社会的主人，又是我们作品中主要的描写对象，所以，当我们描写我们的劳动英雄战斗英雄时要有鲜明强烈的色彩，可以比现实提高，加以理想化。要表现他们虽然目前尚在艰苦的生活中，但是心情愉快，坚强，有自信心，一切有办法的作主人的崭新姿态，因为这才是合于人民时代的实情与需要。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的颓废文人，不写初升的太阳，而爱写日落，不写朝霞，而爱写夜雾，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上正如落下去的太阳一样。今天我们写工农兵就一定要写他们正像初升的太阳面向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情绪高昂，精力旺盛，充满自信，我们一定要在作品中把它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③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②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文集》第2卷，第235页。

③ 茅盾：《欣赏与创作》，《进步日报》1950年1月11日。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弥漫欢乐的心绪和朝气蓬勃的气氛，文学界也洋溢着夜雾过去、朝霞飞升的“早春情调”。大量的颂歌赞美着新生活。众多的英雄人物涌现于作家笔端。悲观、忧愁被视为灰色的。爱情被描述为“劳动+奖章”。即使是孙犁传达苦难岁月的《山地回忆》（1950年），也飘逸着故土诗意的芬芳。

应当说，五十年代中期是“共和国文学”的特征的性质被描述者定型的重要时间。1956年中国内地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取得胜利，反胡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使当时文学界的领导人有理有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文学”的理念。周扬在1957年9月一个总结性发言中对此作了论述：

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的一种新型的文学。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把工人、农民的劳动和斗争当作作品的主题。真正的劳动者，那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在过去的作品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地主、贵族、商人、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占据了过去作品的绝大篇幅。这是不公平的，社会主义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不合理的现象。为劳动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方针。它以无比的热情肯定和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它描写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新的道德和风气，描写了那些逐步摆脱了旧社会影响的新的、新的人物、新的性格以及他们对旧事物旧思想的斗争。从来没有一种文学能够像社会主义文学那样有力地肯定生活、肯定现实，那样坚定地相信人类，相信未来，相信人民的无穷的创造力。从来没有一种文学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能够像今天的文学这样彻底地解放，

有这样乐观的精神，雄伟的气魄，远大的理想。我们的文学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教育的武器，受到了人民的最广泛的支持和热爱。^①

“社会主义文学”观念的提出，尽管当初是理想化的预设，却也不乏可以列出的实绩。作为独立文学阶段的标示，是在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后，出现了一批可资献礼的作品。在当时有相当影响的，如《红旗谱》（1957年）、《青春之歌》（1958年）、《苦菜花》（1958年）、《在和平的日子里》（1958年）、《红日》（1959年）、《创业史》（1959年）、《槐树庄》（1959年）、《红旗歌谣》（1959年）、《王老九诗选》（1959年）、《李双双小传》（1960年）以及《红岩》（1961年）、《放歌集》（1961年）等小说、诗歌、戏剧，为共和国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写下“崭新的一页”提供了“质”的说明。它们赋予“社会主义文学”以这样的涵义：内容上，以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主要题材；人物上，工农兵劳动群众为作品主人公；风格上，以肯定生活、歌颂革命与斗争的豪迈乐观为主导风尚；形式上，以民族化、大众化为艺术追求；创作方法上，以从苏联译译过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范本、为不可违逆的法门；创作队伍上，以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为骨干；生产与传播方式上，则通过“计划经济”的途径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等等。应当确认，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理念和创作的初步实践，体现了传统的社会教化和现实的主流倡导的特征，体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建设属于自己的文学的争取，体现了当代作家在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方面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全面革新的探索。由此而生发出的有异于前的文学新质，无

^①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疑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的一次重要改写。

然而，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去看，“社会主义文学”在当时的提出与倡导，从概念的完整性到实践的科学性，与“满负豪情”的同时，也不免存在简单和幼稚的缺憾。从理论上讲，它将“社会主义文学”视作同以往一切文学的历史分界点，客观上导致了与远传统（古典文学）、近传统（“五四”文学）的疏离，它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惟一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道路，客观上影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认真实施；从创作实践上讲，它对于大一统文学格局和工农兵文学形态的坚持，未必能赋予原来属于“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文学以真正的、活跃的、新的生命。动机与效果形成的悖逆，以“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尤以后者更为突出、严重。“否定一切”的大批判运动和“舆论一律”的“样板化”实践的互动，并步步升温，造成了大批作家的“失语”和“变态”。即使如郭沫若这样的一代文豪，也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开始时如此忏悔：“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①另一方面，被民间戏称为“八亿人民八个戏”，则以“革命样板作品的榜样力量”，受到了至高无上的推崇：“从历史上看，塑造哪个阶级的英雄形象，由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文艺舞台的主人，是政治斗争在文艺上的集中反映，是文艺为哪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主要标志。搞京剧革命，就是要着重塑造好

^① 郭沫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使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把千百年来被地主资产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明确提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我们的文艺运动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界限。只有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能在文艺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孔孟之道，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只有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能在文艺舞台上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革命时期、各条路线上的伟大胜利，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只有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这一根本任务，就是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原则问题。”^①这也说明，当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概念被不适当地强调并推向极端，文学很容易被紧紧捆绑在社会政治的大机器上，特别是在政治多变的时候，文学必定在疲于奔命中逐渐丧失自身。自然，出现在“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对于政治斗争几近癫狂的“配合”，又为后人保留了社会盛衰、政治进退的大不幸画面和氛围。

起自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大陆的文学得以中兴，“社会主义文学”步入改革开放的轨迹，其涵义，其内容与形式，也得以摆脱单一和僵硬的模式，开始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道路。将“从属于政治”易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变更，标志着“共和国文学——阶级斗争‘晴雨表’——工农兵文学形态”的文学规范受到质疑而削弱，标志着用某种单一的概念绝对地支配一元的文学格局之事实上的不

① 初澜（前文化部写作组笔名）：《京剧革命十年》，《红旗》杂志1974年第4期。

可能，也标志着沿着大的方向和总的目标，共和国文学应当有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文心、更多样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近二十年的文学实践，再一次证明了邓小平对发展共和国文学的论断：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①

共和国文学的历程也启示我们，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和文学公民的作家艺术家，其艺术生命不在于追随时政与政策而在于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其艺术原动力来自人民由精神上的被动转入主动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其艺术价值在于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而转化为审美的结晶，成为人民勤劳、智慧、奋斗与创造的艺术影像。近二十年来文学从“为政治”到“为人民”的调整，是文学观念的解放，催动了共和国文学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一个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统一的新阶段，

^①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邓小平文选》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